

文献保护 专刊

Document Protection Issue

主办：国家图书馆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图书馆报

2020年9月25日

第15期

06 业界动态

国图举办全国古籍修复技艺竞赛暨成果展

07-09 特别关注

抗战时期典籍文献抢救保护学术研讨会召开

第四届中华藏书文化论坛在京举办

你不知道的图书馆古籍人

国家图书馆“书山有路”系列互联网直播活动启动

10 业务探讨

牙签万卷痕谁触 手泽百年迹尚新

谈谈古籍的卡片式目录

11 理论园地

对《杜骗新书》成书环境、
书名原貌和其版本流转的考证

12 图书推荐

打造精品 服务读者

《读通鉴论》编辑手记

国图举办全国古籍修复技艺竞赛暨成果展

本报讯 9月1日,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国家典籍博物馆)联合全国各省级古籍保护中心共同举办的“妙手补书书可春——全国古籍修复技艺竞赛暨成果展”开幕式在国家图书馆举行。

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国家典籍博物馆馆长饶权出席活动并致辞,他指出,此次竞赛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举办的全国范围的古籍修复技艺竞赛,汇集了全国21个省43家单位推选的百余册件参赛作品。目前,评审工作已经完成,结果将择日向大众公布。此次展览在汇集参赛作品的同时,还将

展出《赵城金藏》、敦煌遗书、《永乐大典》等珍贵古籍修复作品,这是目前以古籍修复成果为主题的规模最大的展览。

该活动是对我国古籍修复成果的具体呈现,也是对我国古籍修复人员水平的实际检验。展览展出了修复竞赛作品和珍贵古籍修复成果共103册件,涵盖敦煌遗书、早期佛经、宋元善本、金石拓本、明清古籍、少数民族古籍等。同时,展出了古籍修复工具设备以及古籍修复用纸等实物,通过修复专家视频讲解、修复师现场演示、观众互动体验等方式,立体展示古籍修复技艺,进一步推动古籍修复事业发展。

据悉,自“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十分重视古籍修复工作和修复人才培养,共建立12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依托“培训基地、高等院校、传习所”,通过举办短期培训班、招收古籍保护专业硕士、师带徒等多种方式培养古籍修复人才,使修复人员从不足百人发展壮大至千人。目前,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全国附设传习所已达32家,传习导师28位,收徒241人。全国古籍修复室面积超过2.7万平方米,抢救修复古籍总量达到360万叶,古籍修复工作成效显著。

四川省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 9月10日,四川省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在四川省图书馆举行。包括四川21个市(州)文旅系统、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四川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等在内的百余名相关单位负责人参会。

会上宣布了第二批四川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和古籍保护单位名单并授牌。成都市郫都区图书

馆、宜宾市图书馆等6家单位入选第二批四川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简阳市图书馆、崇州市图书馆、大邑县图书馆、叙永县图书馆等12家图书馆入选第二批四川省古籍保护单位。

近年来,四川省通过引入先进的修复设备,借助现代化仪器,令古籍修复工作更加规范和科学,对引导省内有条

件的单位进行古籍修复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下一步,四川将集中突破一批“老大难”单位的古籍普查工作,推动跨界普查,建立四川省古籍信息数据库。同时,探索在四川全省推行“四川省古籍保护点”的申报评审,以评促建,帮助更多的地区和单位改善古籍保护条件。

复旦大学探索古籍保护人才培养新模式

本报讯 9月10日,“国家古籍修复技艺中心—复旦大学传习所”举办了全国首届学员结业、新学员拜师、赵嘉福先生古籍保护从业六十周年暨复旦从教六周年纪念会、传习所人才培养研讨会等系列活动。这是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以下简称“传习所”)设立以来首次举行结业仪式,并以专家座谈和研讨会形式,携手学界和行业专家探讨传习所

“古籍保护人才”培养模式,共同推进古籍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

复旦大学传习所成立五年以来,聘请了古籍修复、木版水印、书画装潢、鸟虫篆刻等各方面导师,以“师带徒”形式进行古籍修复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传习所特聘上海博物馆退休书画修复装裱师沈亚洲、沈维祝和鸟虫篆刻师徐谷甫三位导师,有力地加强了传习所的力量,也为文物保护

创新研究院的纸质文物修复保护专业硕士培养提供了师资保障。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采用“传习所”与“专业硕士”培养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为年轻修复师提供精进传统修复技术的渠道,另一方面为青年学子提供学习科学和人文专业知识的机会。老、中、青三代修复师密切配合,教学相长,共同为古籍保护事业贡献力量。

《今注本二十四史》(首批7种)出版

本报讯 《今注本二十四史》项目启动于20世纪90年代,历经20余年,首批七种(98册)近日面世,分别为:《三国志》《宋书》《南齐书》《梁书》《北史》《隋书》《金史》。

《今注本二十四史》项目总编纂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政娘研究员,执行总编纂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赖长扬

研究员、孙晓研究员。国内二十多所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三百余人参与项目编纂。“史家注史”是本项目的重要特色。第一批七种史以“百衲本”及中华书局点校本为底本,参酌古今研究成果,大量引用最新出土文献及考古发现,重新标点校勘,复加以注释,补充史料,考证史实,疏通文意,

学术价值突出。如《今注本二十四史·金史》纠谬二千余条,许多误读、误断,均在碑刻文物的印证下,得到令人信服的改正。《今注本二十四史·隋书》经历了杨志玖、马俊民、张玉兴三代主编,前赴后继,反复锤炼。首批7种的正式出版,将成为本年度史学界和文化界的一件盛事。

杭州图书馆馆藏古籍数据库正式开通运行

本报讯 近日,杭州图书馆馆藏古籍数据库正式开通运行,这将使得读者在不损害原生古籍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和开发古籍,可谓一举多得。杭州图书馆馆藏古籍共计四万余册,善本

六百余种,其中有42部古籍入选《全国珍贵古籍名录》,另有38部入选《浙江省珍贵古籍名录》。为了更好地保护古籍,方便广大读者阅读使用,从2019年开始,杭州图书馆着

手将古籍数字化,并分批次上线发布。本次发布的古籍数字资源,共计221部,涵盖了稿本、抄本、名家批校题跋本、套印本等诸多特色馆藏,内容丰富、质量上乘。

文澜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入藏国家图书馆

本报讯 8月26日,2020年度“中华传统晒书活动”之“樟湖孤山 问津娜嬛——庚子晒书雅集”在浙江图书馆孤山馆舍青白山居举行。活动期间,浙江图书馆向国家图书馆赠送“镇馆之宝”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影印本1559册。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

表示,“国图本身藏有文津阁《四库全书》原版,后来又入藏来自台北的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影印本。现在有了文澜阁本的影印本,也就是说,国图从此有了第三个版本的四库全书。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利用好这套国本,把1559册书带回国图后,要围绕这套书做活动,要展示出来,让大家用好用文澜阁本。”

河北省第二届晒书节暨民间晒宝大会举办

本报讯 9月12日,“传习经典 融古慧今——2020年中华传统晒书活动”之河北省第二届晒书节暨民间晒宝大会在河北省图书馆举行。本次活动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指导,河北省图书馆(河北省古籍保护中心)和《藏书报》联合举办,采取现场直播和录播相结合的方式,分为“开幕式”“晒书展览”“藏书故事分享”等环节,旨在进一步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推广工作,让大众感受读书藏书的魅力。

本次晒书节特邀藏书家宋平生、周启晋、刘洪金、李希海、张玉坤等藏书家展出特色藏品,包括唐代中期敦煌写经、北宋佛经《毗卢藏》、宋刻本《通鉴纪事本末》、清乾隆《姜西溟先生文抄》等36部珍贵古籍。“藏书主题论坛”分享会上,藏书家刘飞、王素军、牛珍涛、赵志国、贾江溶、牛双跃、何涛等人携带心爱的藏品,与读者分享藏书背后的故事,并就“河北地方藏书特色”“民间藏书专题与研究”等进行了研讨。

第十二期少数民族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在云南省图书馆开班

本报讯 9月16日,“第十二期少数民族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在云南省图书馆开班。本次培训班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云南省图书馆承办,来自云南、四川、甘肃、青海、西藏等省藏文古籍收藏单位的50余位学员参加培训。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苏品红,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共文化服务处处长郭振荣,云南省图书馆馆长、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马云川等出席开班仪式。

本期培训班为期14天,邀请西藏图书馆古籍保护专家白张、迪庆州藏学研究院藏学研究专家杨立生讲授藏文古籍保护知识,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云南传习所导师杨利群全程教授古籍修复实践课程。培训以迪庆州藏学研究院藏的破损藏文古籍修复为实践课教学内容,力争通过修复实践,让学员掌握藏文古籍修复技法,能够对本地区的民族古籍进行维护和修复,推动全国藏文古籍保护工作的开展。

中山大学举办第四场青年学者论坛

本报讯 2020年,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迎来四十周年的生日。9月19日,作为四十周年院庆的系列学术活动之一,在线举行了主题为“科技与传承:新时代古籍保护学科的使命”的第四场青年学者论坛。

论坛邀请了来自国内古籍保护学科领域的6位青年研究者做主旨报告,并开展了相应

专题的自由研讨。六位主讲嘉宾分别为:上海大学副教授熊静、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刘蕊、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闫智培、华南理工大学博士生何贝、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蔡梦玲、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副教授周旖,他们共同在线打造了一场关于古籍保护的知识分享盛宴。

抗战时期典籍文献抢救保护学术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 9月4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抗战时期典籍文献抢救保护学术研讨会”在国家图书馆召开。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副馆长魏大威,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出席,部分省级古籍保护中心负责人和专家学者、新闻媒体代表等60余人参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加强资料收集和整理这一基础性工作,全面整理我国各地抗战档案、照片、资料、实物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必须坚持正确历史观、加强规划和力量整合、加强史料收集和整理、加强舆论宣传工作。”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中华民族在抗战时期为抢救保护珍贵典籍文献,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是民族记忆和民族精神中不可磨灭的重要内容。

本次研讨会是积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的重要举措,也是继抗战70周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抗战时期古籍抢救保护史迹研讨会”后,我国图书馆界再一次全方位、多角度地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破坏中国文化典籍、展示我国民众抢救保护珍贵典籍文献的重要活动。活动旨在让社会公众深入了解抗战时期典籍保护工作与文化抗战历史,缅怀前贤在民族危亡之际抢救保护典籍之事迹,深切感受中华典籍劫后幸存之不易,弘扬红色革命文化,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掠夺破坏中国文化典籍的罪行。通过让事实说话、为历史发言,使民众牢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牢记中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自由、捍卫祖国主权尊严、保护民族文化遗产所建立的伟大功勋,这对于进一步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促进中华典籍保护与传承,推动抗战史料收集整理,激励广大图书馆人继承抗战前辈的光荣传统,做好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整理者、宣传员、守门人具有重

要意义。研讨会上,多位专家学者以大量生动丰富的历史图片、影像和翔实记录,分别讲述了抗战时期合众图书馆等先贤抢救保护典籍文献、八路军抢救保护《赵城金藏》、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贵阳、梅冷生抢救温州重要典籍文献等伟大壮举;揭示了郑振铎抢救典籍文献的新史料;丰富了抗战期间王重民在美国为抢救和整理中华典籍文献的历史细节;介绍了国家图书馆、重庆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等单位对馆藏历经抗日兵燹劫难典籍和民国时期抗战文献的保护整理与研究开发。与会学者们的发言展现了抗战烽火下中华典籍饱经战乱的颠簸命运,回顾了前辈先贤守护文明的艰辛历程和感人事迹。正是前辈们的努力,才使得大批珍贵典籍文献得以保存并传承至今,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前辈先贤以自己的一腔热血丹心,在抗战时期为典籍保护奔走呼号、无怨无悔,为当代文化工作者和典



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副馆长魏大威在研讨会上致辞

籍保护工作者树立了典范。同时,这些发言也梳理了当代图书馆界在保存抗战文献、挖掘抗战典籍文献资源上所做出的努力,展现了当代图书馆人的历史担当和使命意识。据悉,2020年7月,抗战时期抢救保护典籍文献重要事例征集工作正式启动。在全国各省级古籍保护中心的积极支持下,国

家古籍保护中心征集到来自全国各地12家单位的21篇文章。在这些典籍抢救保护事迹中,既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图书馆同仁勇护国宝、坚守职责的无私举动,也有社会各界仁人志士不顾安危、抢救典籍的感人事迹,还有当代图书馆界致力于抗战文献保存与保护工作情况的宣扬介绍。

第四届中华藏书文化论坛在京举办

本报讯 9月7日,由第18届北京国际图书节组委会、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办,韬奋基金会全民阅读促进会、北京华宝斋文化有限公司、北京古话今语文化有限公司协办,北京百科娜嬛书房承办的第四届中华藏书文化论坛在北京举办。本届论坛围绕“藏书文化与书香社会”的总议题,分设“藏书文化的人文精神与当下传承”“元典阅读与文脉传承的系统建设”“藏书文化与当代民众生活的重塑”三个分论坛展开。

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王伟光,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文化服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陈彬彬,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野霏,罗新、韦力、余世存等知名文化学者共40多人参加了论坛。论坛由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辑兼《晶报》总编辑胡洪侠主持。

2020年,一场史无前例的疫情考验,使中华儿女获得一次反省文明根脉、振奋民族魂魄的契机。第四届藏书文化论坛遵循“读而藏,藏而传”的文脉传承路径,聚焦藏书文化传承传播路径、方法以及重塑书香生活方式,引导人们在场景体验、礼仪规导、思想体悟、情感连接等方式的立体生态中,回归书香生

活,倾心元典阅读。王伟光指出,藏书文化对于任何一个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民族都意义重大。中国的藏书文化源远流长,从公家到私人,从机构到个体,这一历史过程艰苦卓绝,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具有5000年绵延不绝的韧性,和藏书文化有着直接关系。因此,藏书文化的兴盛,维系着中华民族文脉传承的历史命运,表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兴旺发达。当前,在国家的号召下,在社会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多读书、读好书正在成为普遍的社会共识。我们也看到,人们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对于何为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尽管有了整体的认知,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仍然存在不少困惑和矛盾,由此引发了不少问题和乱象。在该届论坛上,来自不同领域的嘉宾围绕文脉传承、藏书文化、元典阅读展开深入探讨和交流,这对于引导人们藏经典、读经典,对于推动全民阅读的健康发展、倡导更高品质的书香生活,无疑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和典型示范作用。

在分论坛环节,孟繁之、韦力、陆世栋三位学者就藏书文化的人文精神与当下传承展开阐述。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一方面通过动态的传承活在世代相

因的言行之中,另一方面更多地以文字的形式记录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这其中被称为文化经典的书籍,正是被反复证明和阐释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因此当下传承的核心是回归元典,以纠正继承中的诸多问题和乱象。

王野霏、刘翔宇、孔国庆、杨晓华就“元典阅读与文脉传承的系统建设”进行了深入讨论。他们认为,在当下社会,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时,要注重方式和形态的创新。任何时代的文化遗产和文化复兴,都是在特定文化需求和氛围中实现的。文化传承要走向深入,必须突破单一思维和说教方式,营造符合当下人们习惯的整体生活样式,以实现自觉和非自觉的文化熏陶。北京百科娜嬛书房开展的文传馆项目以《中华善本百部经典再造》丛书为核心,立足读元典、理文脉,以中国书籍编辑史、中国古代藏书史为抓手,以中国书籍承载的中华人文精神为落脚点,以“实景+实物”的方式,让大众触摸、交流、互动、品鉴书籍文化,让深藏在图书馆、博物馆里的中国典籍走进大众生活,这是一种良好的尝试。

罗新、余世存、尹磊三位学者就“藏书文化与当代民众生活的重塑”发表了看法。他们指



第四届中华藏书文化论坛现场嘉宾对谈

出,一个文化兴盛的社会的前提是阅读文化的兴盛。提倡公共阅读的主旨在于人文滋养和新的生活习惯的养成。要迎接一个更好的文明社会的到来,要有普遍高品位的阅读生活作为先导。中国人要提升生活品质,要提高文化素养,要从传统经典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必须仰仗民族阅读生活的重构。

北京百科娜嬛书房创始人蒋凤君表示,中国的防疫抗“疫”已进入常态化,人心沉静,情理通融,人们期望在自我与现实的深刻警醒中,创设更有价值和意蕴的生活方式。本届名家云集的论坛,为阅读世界导入

亲近中华元典、提升生活品质的思想牵引和现实范例,也将大大助力首都北京彰显文化中心的价值和能量,激扬首善之区的品格和气场。

中华藏书文化论坛以“传承中华文脉,构建传承体系”为宗旨,围绕藏书文化、古籍活化、家族传承等主题已先后举办三届,均取得了良好反响。论坛致力于协力学术、教育、收藏、媒体界的高品质社会资源,通过藏书理念的传播和弘扬,促进藏书文化在更广阔的时空内产生更广泛、更有效的影响,建立以藏书、读书为媒的精神文化共同体。

你不知道的图书馆古籍人

国家图书馆“书山有路”系列互联网直播活动启动

为了让图书馆界的朋友拥有讲述心声的园地，也让喜欢图书馆、对图书馆员职业有好奇心的朋友们了解此间世界，国家图书馆推出“书山有路”系列互联网直播活动，把腼腆、低调、有内涵的图书馆人推到观众面前，聊一聊这厢的袖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8月22日，第一期“书山有路”在光明网、央视频、文旅e家APP、国图抖音、国家图书馆官方微博、国家图书馆京东旗舰店等直播平台启动，由国家图书馆馆员韩华、刘波、南江涛、洪琰、郑小悠作为嘉宾和主持人出境，虽然他们的工作内容与形式各不相同，但都交汇于一点——中国历史典籍。这些长年工作在故纸堆旁的馆员会有怎样的职业成长与心路历程呢？让我们听听他们的讲述。

嘉宾：

刘波 现就职于国家图书馆古籍部敦煌文献组，从事过采访、编目、阅览、展览、讲座、数字化、文献整理等各类图书馆业务，主要研究方向为敦煌西域文献、近现代学术史。

韩华 现就职于国家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办公室，从事民国时期文献抢救、保护工作，出版学术专著二部，译著八部，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南江涛 现就职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古籍编辑室，策划编辑多种古籍影印丛书，最著名者即深受广大文史专业师生欢迎的“平民版再造善本”——《国学基本典籍丛刊》。

洪琰 现就职于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正在进行的全国范围古籍普查登记与《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工作。

主持人：

郑小悠 现就职于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从事优秀传统文化宣传推广工作。著有《年羹尧之死》《清代的案与刑》等历史普及读物，担任中央电视台《法律讲堂》栏目主讲人。

郑小悠： 让更多的人了解图书馆、了解图书馆员

“书山有路”是一个系列活动，今天是第一期，我们为什么要策划推出这样一个系列活动？主要有两个初衷，第一个初衷是希望给社会，给不在图书馆工作的朋友们提供一个了解图书馆、了解图书馆员的平台。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我平常没事在网上瞎逛，比如说去微博、知乎、豆瓣这些平台中浏览信息时，经常会看到一个话题就是“如果不考虑收入的话，你最想选什么样的职业？”网友留言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如果不考虑收入，我想做图书馆员”。这让我意识到，图书馆员这个职业会带给大家一种朦胧美，什么叫朦胧美？就是你在并不了解的情况下非常向往。所以我们推出“书山有路”这样一个活动，希望大家通过这个平台了解图书馆、了解图书馆员，如果能在了解之后还向往，那才是真向往。

第二个初衷是我们想提供一个平台，让图书馆员有一个展示自己、展示自己行业的机会。为什么有这个想法？我在北大读了十年书，北大的环境让人能够张扬个性，大家都会展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后来来到国图工作之后，我在很长一段时间不是很适应，为什么呢？其实国家图书馆也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很多同事都非常有才华，非常有内涵，从图书馆也走出了很多知名的人物，政界的、文化艺术界的都有。但是整个图书馆给人的感觉就是馆员都非常内敛，非常低调，虽然有才华，但是不愿意去展示自己。这可能跟职业的特点，还有机构的性质有关，图书馆是一个为别人服务的机构，所以大家心里会更愿意把我们的服务对象推到前面，从而淡化自己，把自己摆在后面。但实际上现在这个社会已不同于以往，我们虽然是做服务行业，虽然是为大家服务，但是也需



要让我们的服务对象了解我们，让别人知道我们具备什么样的知识、技能、服务能力，这样一来，服务对象才会更好地向图书馆员提出要求，我们才能更好地为他们服务。所以我们希望搭建这样一个平台，邀请一些图书馆员中的代表人物，向社会，向对图书馆感兴趣的朋友们展示自己的日常工作，展示图书馆的文献、展览及各种活动等。

今天这个活动的主题是“你不知道的图书馆古籍人”，关键词是古籍，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主题呢？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创始人，比如说张之洞、缪荃孙，他们创设中国近代图书馆有两个核心目的，一是保存国粹，二是启迪民智。保存国粹是对古而言，是对前面的事情而言。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叫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里面涉及到的主要内容就是古籍；启迪民智是对当下而言，对未来而言，这个在以后的活动中我们也会涉及到。因为创设中国近代图书馆之初就有了这个基调，所以对中国的各级各类图书馆来说，保存国粹、弘扬传统文化是图书馆的核心任务之一，是非常重要的业务，也是图书馆的立馆之本。

南江涛： 做好古籍影印，传承传统文化

图书馆界只有两家出版社，而跟图书馆合作得比较密切（尤其在馆藏整理方面）的出版社当属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记得一位馆领导曾经说过，作为图书馆的出版社搞古籍整理，应该考虑自己的一个优势才对。

这个话说得非常好！40多年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在几代人的不断探索下，确实走出了一条比较专业化的路子——古籍影印。现在中文古籍善本，包括有些少数民族语言的善本，绝大多数藏在图书馆、博物馆里面。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跟这些收藏单位有着血浓于水的联系，所以就抓住这个天然的优势做古籍影印。我来社里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还是以做古籍丛书为主，就是把一个专题的或者是一个图书馆的比较好的文献汇编在一起，做成大套丛书。这些古籍丛书大部分是由图书馆买走了，个别读者也对这个很感兴趣。

《国学基本典籍丛刊》这套书我只是一个实际的操作者，真正的策划者是我们已故的原总编辑贾贵荣老师，主持这个书目审定的是山东大学的杜泽逊教授。应该说这两位老师以及我们前后几任的社领导，都在这个项目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们把宋元版拿出来影印，成本实在很高，但是定价很低。做到这一点，首先是出版社要让利给读者。这套书，实事求是地说，到现在还是亏本的，虽然看着卖得很“热闹”，但属于赔本赚吆喝。一个文化企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反哺社会、反哺学界，展现出了一种责任和担当。我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和具体执行者，也感到非常荣幸。现在这套丛书的平装版我们已经



出版了85种584册，马上就到600册了。

近些年，古籍影印的技术和理念都在变化。2009年，我们的老总编辑徐蜀先生对影印的方式做了比较大的变动：把过去大家都习以为常的白纸黑字这种印法，变成了现在的灰度印刷。大家看到的《国学基本典籍丛刊》就是我们原书彩色扫描之后，用灰度处理的方式来印刷的，而不是把底全部去掉。另外，现在的印刷技术越来越好，成本也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在原有《国学基本典籍丛刊》的基础上，又把它提升了一下，直接做成全彩的，开本上也放大了一点，做成精装。这样一方面，我觉得这套书虽然不能做到100%的还原，但是应该算是目前做整体彩印古籍中，在包装、定价各方面都比较普惠大众的丛书。

另外，我们还探索了一下线装四色的仿真本。我们做了国图宋本中的白眉之作——《河东先生集》和《昌黎先生集》。两个一头一尾，2019年等于是推了两部。第一部大家收到之后，对修图制版以及印刷质量

很认可。第二部上架当天，四个半小时竟然全卖光了。原因很简单，我觉得现在大家还是怀有迫切想要了解古籍的这种心愿的。你只要做得到位，做得好，就有人喜欢。影印古籍是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来传承传统文化的，这一点是它的绝对优势。

最后我还想多说一句，其实古籍影印也没那么简单，想做好也不容易。首先要做好选题策划。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永乐大典》、敦煌遗书这些大家都知道的珍贵典籍之外，我们有大量的普通古籍，这里真的是一座富矿。我们根据学界比较重要的专题或研究方向，去做一些资料的整合和汇编。因为普通古籍也不普通了，最年轻的也都100年了，也不是市面上能够经常见到的，这样的资料汇编反而是能够迅速得到相关学者去做研究。选题策划之后，就要去获取底本，在这一方面国图出版社比兄弟单位略有优势。通过跟图书馆，包括一些私人藏家沟通，去获取我们需要的或者学界急需的一些底本资源，然后再进行技术加工，把它给印出来。实际上最大的困难也是很多学者、老师经常遇到的，就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底本在哪里，但是不一定方便获取，或许是这个书库搬家，获取不了，或许是各种政策的不允许等等。但我觉得这是个时间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都会慢慢地解决。在后半段的制版印刷都是一些技术活。看似比较简单，但如果编辑不懂，也容易把控不住质量。近期见到一些同行如浙江大学出版社王荣鑫新发的一篇文章，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思考，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找来看看。

韩华: 图书馆员要把馆藏推出去

我在国家图书馆从事西文图书采选工作时,特别想做科研,很想有一些个人方面的发展。受所学专业的影响(我的专业背景是近代儒学转型),我一边工作一边不断积累国家图书馆海外中国学的馆藏信息,比如中国重要典籍的翻译、研究方面的馆藏文献信息,于是就发现国家图书馆的馆藏文献有一些并不齐全,比如说在某一卷里缺一册。

后来部门安排我做西文图书补藏工作,重点工作就是做海外中国学这块。在整个补藏过程中,我个人认为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应该是最全、最丰富的,这种全与丰富体现在馆藏文献在学科体系与知识体系建构方面,所以我从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两个方向,对国家图书馆海外中国学图书进行补藏工作。我会从一个学科的发初期、发展期、确立期、繁荣期入手,从整体上关注它,再选出其中的经典,比如《孔门理财学》这本书,它在一个馆藏学科体系里算是奠基性著作,所以我会把这本书及其作者的著作,以及和这本书有相关师承关系的著作,还有这本书产生的影响,从知识体系的角度加以考虑,进去去建构馆藏。

国家图书馆的收藏是有体系的,它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书库,它比战略储备库还重要。因为它收藏了所有对人类文明有用的、对中国历史与未来发展有用的文献宝藏。

我现在的工作是民国时期文献抢救、保护,直接参与的工作是民



国时期文献整理、立项、项目策划,还有每年的项目评审。每年年初我们要面向全国发出通知,通知全国各级各类文献收藏单位我们今年的重要申报选题是什么。确定当年选题肯定很费脑筋,要考虑当下最切合的文献整理方向是什么,还要从国家图书馆文献收藏的角度考虑,国家图书馆收藏哪些文献。通过整理出版,起到丰富国家图书馆某一专题文献的作用,或者说是发展某一专题文献的作用。各单位申报的选题会涉及到不同领域。我作为一个监督者、项目组织与评审者,如果没有一定的学术积累,不了解相关史料、馆藏、学术前沿动态的话,这项工作便无法开展。所以,我在开展这项工作的同时,重视以下三个方面的学习:第一,了解学术动态。第二,了解馆藏。第三,了解文献。我刚到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办公室

时,就面对东京审判文献的整理,我虽然是学历史学的,但对东京审判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了解得并不多。所以,我首先开始了解国内学界关于东京审判的研究动态与相关文献的整理情况,让自己迅速地进入状态,当时还写了一篇《东京审判研究综述》。接着,我“走进”东京审判历史史料,我当时把东京审判庭审记录·中国部分——侵占东北辩方举证,以及东京审判庭审记录·中国部分——毒品贸易·侵占东北辩方举证进行了简单的翻译整理。在这个过程中,我通过自己的翻译整理,确实确实将文献内容了解得十分清楚,这对后续项目的深入开展,比如在我们整理东京审判庭审记录之后,相继推出的国际检查局讯问记录、马尼拉审判文献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对日战犯审判文献资料丛刊,这和我们真正“走进”、了解文献有很大关系。在读东京审判庭审记录时,我们发现日本贩卖毒品的问题,后来我写了一本书《从东京审判看日本鸦片侵华》,东京审判庭法官韦伯爵士说“检方称这也是一种类型的战争,或者说通过让中国人染上毒瘾从而为战争做准备”,这是侵华日军进行战争的方式。

文献藏在国家图书馆是藏之深山、是庭院深深,图书馆员要把馆藏推出去,让更多人了解,更多人去用它;当然也要把图书馆员的个人研究推出去、传播出去,因为宣传也是一种收藏,是藏在别人的思想里。

刘波: 为读者提供更好的知识服务



我所在的工作单位是国家图书馆的敦煌文献组。国家图书馆于1910年入藏了从甘肃运到北京来的一大批敦煌文献,并很快就开启了编目整理工作,很多老前辈都参与其中,当年我们的敦煌文献就开始对外服务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学者的著作里面,都用到过国家图书馆的敦煌文献,可见当时我们的敦煌文献服务已经开展得不错了。举一个例子,伟大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研究的就是我们馆藏的敦煌文献——《大乘稻秆经随听疏》。

众所周知,敦煌文献在全世界有几大藏家,国图、英图、法图和俄罗斯东方文献研究所,这几大藏家里最早出目录的是国图,那就是陈垣先生的《敦煌劫余录》。到现在,全世界所有的敦煌文献藏家出版的目录里头,最好最详细的,学术价值最高的,也是由国图出版的,这便是前些年方广钊先生、李际宁老师以及很多同事参与编纂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馆创办了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当时中国的敦煌学正处于重新起步、飞跃发展的阶段,那时候中国的学者们因为听到有人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样的话,都很受刺激,奋起直追。然而要提高学术水平,第一步就是要有资料。所以当时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之初,就和北京图书馆商量,建一个资料中心,这就是后来在1988年正式开放的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也就是现在我工作的敦煌吐鲁番阅览室。当时北图就把几十年积累的跟敦煌有关的各种资料,包括英法的胶卷、老照片,还有相关的书刊等各种资料集中在一起,建成了这个很专业的资料中心。

这个资料中心提供基本的阅览服务和接待咨询服务,工作于此的老师们还尽量做一些资料整理工作,让这些文献(不管是敦煌文献还是研究资料)能更方便地为大家所用。我们的老师们编了很多目录、索引一类的工具,这方面我最佩服的就是我们的前辈中国美老师。申老师出版的《中国散藏敦煌文献目录》,把很多机构收藏的敦煌卷子的目录汇集在一起,方便了大家查检使用。

现在我们年轻一代,也继承了前辈们的精神和做法,继续在做类似的工作。比如说我们的同事常蕊心,编了一部《丝绸之路研究著作叙录》,这是一部提要目录。现在国家提倡“一带一路”建设,丝绸之路研究是非常热门的一个领域,常蕊心所做的资料整理工作,对大家了解这个领域的相关进展非常有帮助。我自己也做了一本《丝绸之路研究论文目录》,相对简单一些。我们还有一位同事刘毅超,他现在正在做《汉文敦煌文献题名索引》,这是囊括全世界敦煌文献的总索引,这本书很厚,一千两百多页。出版之后,它是非常好用的工具。

我们现在也做一些数字化工作——国图馆藏的敦煌文献的数字化。国图在2001年就加入了国际敦煌项目,和英国国家图书馆还有其他的一些机构合作进行全球敦煌文献的数字化,把全世界所有的敦煌文献集中在一个数据库里面,这样大家就能一站式查找所有的敦煌文献,做起相关研究来就方便多了。国图加入这个项目后,一直是我们组在负责具体地操作,我们有好几位同事在专职做数字化。现在国图完成数字化的敦煌文献近1/3,速度不算很快,希望以后能够加速把它完成。

总之,我们做的这些工作,从基本的采、编、阅,到数字化、文献整理、文化推广,这几个方面看起来很杂,其实它有一个中心,就是为读者服务。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来转的,目的都是为读者提供更好的知识服务。

(08-09版内容根据活动速记整理,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拟,未经嘉宾审定。)

洪琰: 古籍普查登记工作成果显著

2008年我进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当时我所在的组叫做普查组,但主要工作是评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因为当时进行全国范围的普查,时机还不是特别成熟,基础达不到,普查人员也很缺乏。2012年的时候,古籍普查才全面展开。从2012年开始到现在,八年的时间,这项工作能够达到一个基本完成的程度,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现在完成普查的单位已经有两千八百多家,当然其中有一千多家都是西藏的收藏单位。

古籍普查工作,主要就是针对每一部古籍进行登记,把它的一些基本信息著录下来。其实我们在工作过程当中也是经过反复摸索的,原先要著录的内容非常多,但是因为有时间进度等各方面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的著录项目只是一个基本信息收录,包括这部书的书名、作者、版本、册数,还有索书号和它的收藏单位。这项基础性的工作做到现在,已经将全国270多万部古籍登记在册。最早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包括一些专家学者都不是特别认可,觉得这些信息太多了,但是当这些海量的数据汇集到一起的时候,其实还是能发



现不少问题的。可能将来我们会把这些项目做得再深入些,但是现在把这些海量数据汇集起来,不管是对研究而言还是对工作而言,都为大家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古籍普查登记工作阶段性完成后,我们会进行出版,出版之后的数据会发布在网上,所有人都能在一个完全公开的网站上,查找他需要的书。现在这个网站已经发布了70多万条数据,收录了200多家单位的数据,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网站。所以这里我特别向大家推荐一下这个网站——“全国古

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

《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已经出版,如果去翻翻前言,会发现很多关于图书馆的建立、关于馆藏古籍来源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在普查过程中,有一些不太知名的图书馆,因为它的馆藏而出现在大家眼前。像现在正在进行普查收尾的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在甘谷县图书馆发现了1000余部古籍,其中有十几部明版书。还有安徽的皖西学院图书馆,藏有宋衢州本的《三国志》,收录在《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里,大家好像都没太听说过皖西学院图书馆,但是它收藏了不少古籍,且有不少珍善本。

我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深入到这个工作中,没有去翻哪一本书,去给它著录这些信息,但是我可以通过这些工作成果,知道有这么多人正在做这个工作。前几天跟朋友吃饭的时候,他还问,你在从事古籍保护工作,那你是做修复的吗?现在好像修复工作比较火,可能是受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影响,大众便会觉得做古籍保护就是做修复,事实上古籍保护中有很大一部分的工作是一些基础的古籍编目。

牙签万卷痕谁触 手泽百年迹尚新

谈谈古籍的卡片式目录

□ 邱晓平

走进首都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古籍阅览室，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阅览室门口右侧立着两三排古香古色的柜子，这些紫檀色木制柜子中有很多小小的抽斗。拉开抽斗，一张张纸质卡片依次贯穿在金属条中，这些就是古籍卡片式目录。下面让我们一起一探卡片式目录的究竟吧！

什么是卡片式目录

卡片式目录，顾名思义，就是以卡片为载体，把书的相关信息著录在卡片上形成的目录。图书馆所用的目录卡片，尺寸大小是固定的，高7.5厘米，宽12.5厘米，上印红色直线两条，其余横线约十行，下面正中打一孔眼。但也有许多图书馆为了方便和让内容看起来清楚，取消了卡片的淡色横线，或没有直线和横线。

目录卡片著录了书的多种信息，如书名、著者、版本、图卷、细目、附注等，清晰客观地反映着书的基本情况。卡片式目录按一定顺序排列，如读音顺序、笔画顺序、四角号码顺序等。其种类较多，有书名卡片式目录、著者卡片式目录、丛书卡片式目录、分类卡片式目录等，可以满足读者的不同需求。

卡片式目录的历史

卡片式目录在图书馆的使用颇为久远。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许多寺院图书馆和私人图书馆被收为国有，国民代表大会指示为这些藏书编目，并要求使用卡片式目录。十九世纪末，美国图书馆开始普遍使用卡片式目录，并形成比较一致的编目规则。二十世纪初，卡片式目录逐步取代了历史更为悠久的书本式目录，成为图书馆的主要目录形式。

在形式上，古代藏书者所用的书签或牙制签牌与目录卡片有相似之处，它们多夹在书函或书轴中，上标书名，可备检取。牙签没有与书分离，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目录。中国的图书目录自汉代刘歆《七略》开始，几乎全是书本式目录。1908年，位于上海的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最早采用卡片式目录。辛亥革命后，清华大学图书馆和南洋大学图书馆也较早采用卡片式目录。1918年，武昌文华公书林也制作使用卡片式目录。

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后，卡片式目录在中国逐渐普及。1926年，东方图书馆制成目录卡片40余万张。1936年后，北平图书馆和中央图书馆还进一步印刷了目录卡片供图书馆使用。

首都图书馆的古籍卡片式目录

1917年，京师通俗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前身之一）开始使用卡片式目录。读者今天到首都图书馆历史文献阅览室可以发现：首都图书馆的古籍卡片式目录有古籍题名卡片式目录、古籍著者卡片式目录、古籍分类卡片式目录三种，各自在相应的目录柜当中。

(1) 题名卡片式目录

题名卡片式目录也称书名卡片式目录，这种卡片式目录以文献名称的形式揭示图书馆收藏的文献。题目目录卡片的第一行是书名信息，其他信息如索书号、作者、版本、册数等在第二行或其他行。如果知道书名并且需要通过书名查找书号、版本时，可以查阅题名卡片式目录。

首都图书馆古籍题名卡片式目录，是按笔划顺序进行排列的。查找某书时，先数出书名第一个字的笔画数，然后找到写着相应笔画数的抽斗，在里面找到对应的字，再找到想查找的书目卡片。如想查找《文选》一书，即先数出“文”的笔画数，然后找到笔画“四”的抽斗，在笔画数“四”的卡片中找到第一个字为“文”的卡片，再在这些卡片中找到《文选》一书的目录卡片。如想查找《汉书》，也是数出简体“汉”字的笔画数，在笔画数为“五”的卡片中找到第一个字为“汉”的卡片。书名相同的卡片都排列在一起，查找这一种书的不同版本非常方便。

(2) 著者卡片式目录

古籍著者卡片式目录是依据文献的著者按照一定顺序编排而成的卡片式目录，以著者的形式揭

示图书馆所藏文献。想要查询某一作者的相关著作，通常即查阅著者卡片式目录。

首都图书馆古籍的著者目录卡片，就形式而言，与书名目录卡片基本相同：卡片的第一行是书名信息，其他信息如作者、版本、册数、书号等在次要位置，但作者被画上红线以示强调。

首都图书馆古籍的著者目录卡片也按笔画顺序排列，查找时，按笔画多少，先找到姓，再按姓名第二字的笔画数找著者姓名。有的作者作品很多，这些作者就被单列出来，可以让读者一目了然。

(3) 分类卡片式目录

分类卡片式目录是依据图书馆所采用的分类法，按照文献内容的学科体系组织而成的卡片式目录，它反映出图书馆某一学科中某类文献的收藏情况。

首都图书馆的古籍分类卡片式目录按传统的四部分类法进行排序。大类分为经史子集从，大类之下又有小类，如经部中有经总类、易类、书类、诗类等二级类，经总类中有群经合刊、群经总义等三级类，群经总义类中有传说、图说、文字音义等四级类。想做某个专项的研究，可以翻检古籍分类卡片式目录。通过以类求书，能够了解到图书馆某一类古籍有哪些馆藏，也可能在翻阅分类卡片式目录时有新的发现。

卡片式目录的特点与式微

卡片式目录与之前的书本式目录相比，有自己的特点：以卡片记录某种书的内容，安全、稳定；卡片可以随时增减、重新组合、不断更新，便于图书馆员编目；对于读者来说，目录卡片不必借助于电力、服务器、网络等手段，阅读方便，内容直观，也便于全面浏览馆藏书籍。虽然在进入计算机时代后，卡片式目录因为占用体积大、不便于增加检索点等原因，渐渐被束之高阁，但在一些图书馆的古籍阅览室，它还与机读目录互相补充，继续为读者服务——毕竟对于部分习惯纸质阅读、不习惯或不会使用计算机的读者而言，手检卡片式目录是最好的选择。

首都图书馆古籍目录卡片，有电脑排版的，有铅字打印的，还有不少为手写的，莹然如新与已然泛黄相夹杂，颇具时代沧桑之感。这些小小的卡片，跟随着馆藏古籍，从东城区的国子监到朝阳区的华威桥，在历史和岁月的变迁中，默默履行着自己的使命。看到这一张张卡片，读者应该也会感触良多吧！



卡片目录柜



题名卡片式目录



著者卡片式目录



按笔画顺序排列的题名卡片



按笔画顺序排列的著者卡片



分类卡片式目录

对《杜骗新书》 成书环境、书名原貌和其版本流转的考证

□卫宇辉(中国版本图书馆)

《杜骗新书》是中国古代唯一一部以骗术为主题的专著,成书之后,《杜骗新书》的版本又经历了书林张怀耿刻本和陈怀轩存仁堂刻本的演变,直至该书在中国国内的消失和现今的重现世间。在本文中,笔者通过分析目前可见的明刻本、明抄本和明写本,考证了《杜骗新书》成书环境、书名原貌和其版本流转。

《杜骗新书》成书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五年(1517),是中国第一部专门以“骗术”为写作对象的专著。

古代的文人,把写作视为很严肃很庄重的事情,但凡著述都要“传道授业解惑”。《杜骗新书》这类书,长期不为读书人所重视。不过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世风的变化,著书立说也从最初的记录圣人言,慢慢地变成了对人生、对人性、对生活、对世道的表述。这其中,有对自我心迹的追寻,有对爱情的咏叹,有对未知的探究,而《杜骗新书》就是当时晚明世风的产物。早在宋末,以各个主题为对象的专著已经出现了,却唯独没有描写骗子的专著。为什么到了明代才有人去写,这其中的缘由是什么?这个问题有必要探讨一下。

《杜骗新书》 成书的背景分析

南宋刘克庄的《后村集》里卷五十二有一篇《庚申召对》,里面提到:“臣惟国家三数年来,凶相弄权,以富强自诡,辅圣天子而行霸政,为天下宰而设骗局。”中国到了宋代,特别是南宋,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商品经济开始活跃,商业、手工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到了晚明,随着一条鞭法的实行,农业商品化的浪潮相比前朝更甚,于是从商成风,从王公大臣、士绅名流,“多以货殖为急”(黄省曾《吴风录》),以官为高,官商结合,而一般百姓也“不置田亩,而居货招商”(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淮扬人户,多弃业逃徙,以兴贩为业”(明世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九),“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三)。在这股全民重商的潮流中,很快出现了一批大手工业主和大商人。商人特别是富商的出现除了猛烈冲击当时传统的社会制度外,这一阶层的奢靡生活作风无疑对当时的世风起了重大影响。于是,“嘉靖以来,浮华渐盛,竞相夸诩,不为明冠明服,务为唐

巾晋巾,金玉其相,锦绣其饰,扬扬间里”(沈朝阳《皇明嘉隆两朝闻见记》卷六)。在这种以金钱为中心的社会环境中,“由嘉靖中叶以抵于今,流风愈趋愈下,惯刀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珠艳色为盛礼。其流至于市井贩育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细鞋,纱裙细裤。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焉勿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逐末游食,相率成风”(《博平县志》卷四)。各个阶层的人都想着一夜暴富,诈骗等不正常手段自然也就盛行起来。

在晚明,文学风气越来越世俗化,如《金瓶梅》、冯梦龙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以及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等的出现,更让小说这一文学体裁成为主流,这也是《杜骗新书》得以成书的文学环境。

《杜骗新书》 书名原貌的考证

据笔者考证,明刻本和明写本的《杜骗新书》,目前只有一部存于国内,即大连市图书馆里的陈氏的后刻本,其它的分别藏于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陈氏的后刻本)、日本尊经阁文库(陈氏的后刻本)、内阁文库(陈氏的后刻本以及一本写本)以及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陈氏的后刻本以及一本抄本)。

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均收藏的是存仁堂陈怀轩的后刻本、大连图书馆藏本,据考“无序,行款全同于日本内阁文库”,因此也是陈氏的后刻本。

而包含有熊振骥叙的本子,未见有刻本传世。之所以说以上几种是后刻本的依据,在于此书卷一第一页第三行刻有“书林□□□□梓”,□内文字被铲版。根据笔者对日本双红堂文库所藏的传抄本的考证,该处有“书林汉冲张怀耿梓”。以此推论,此书最早为明万历书林张怀耿刻本,后陈怀轩存仁堂得其版,铲去

“汉冲张怀耿”五字。这种情况在当时的书肆行业中是常有的事,并不奇怪。据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研究科的佐野诚子调查,日本江户初期著名汉学家林罗山(Hayashi Razan)遗藏有《杜骗新书》的写本,现在也藏于内阁文库。其中就包含书叙和正文中,凡遇人名、地名和书名之处,均用红笔或单线或双线直书标出,书末有朱笔“罗山考之”字样,故知这些朱笔批点系林氏所为。另外,熊氏叙的首页上部铃有篆文“林氏藏书”朱印一方,也可印证这一结论。叙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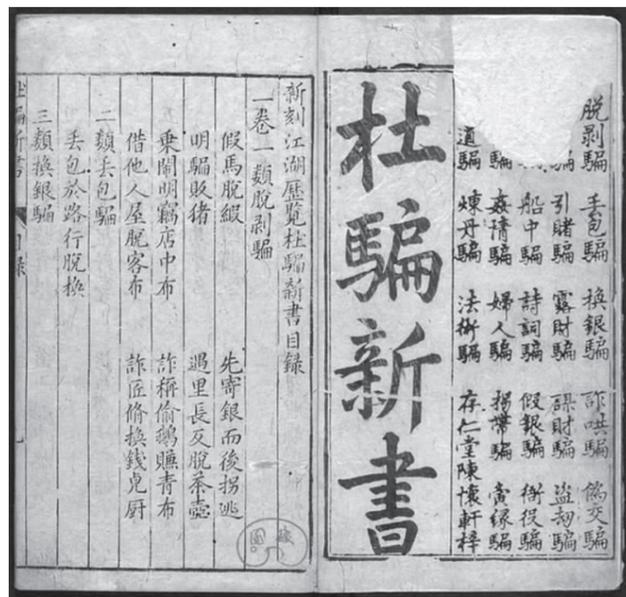
“是集之作,非云小补。揭季世之伪芽,清其萌集;发奸人之胆魄,密为关防。使居家长者执此以启儿孙,不落巨奸之股掌。即壮游年少,守此以防奸究,岂入老棍之牢笼?任他机变千般巧,不越奚囊一卷书。故名曰江湖奇闻,志末世之弊窳也;曰杜骗新书,示救世之良策也。其裨世也甚大,其流后也必远。遂为数语,聊叙其概。”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杜骗新书》的最初名称是《江湖奇闻杜骗新书》,只是在后来刊刻时才改作《江湖历览杜骗新书》的。

而在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善本书库里,《杜骗新书》的名称则是《鼎刻江湖历览杜骗新书》。而根据发现的东洋文库的“冈田真之”的抄本,它完整地保存了正文前“书林汉冲张怀耿梓”的题署,且卷首署有“三岭山人熊振骥”的《叙江湖奇闻杜骗新书》一文,可见《杜骗新书》的最初名称也被叫作《叙江湖奇闻杜骗新书》。

《杜骗新书》何以在中国 绝迹而在日本广为传播

如本文开篇所述,《杜骗新书》的成书和传播是和当时晚明的整个世风和世俗文学的流行紧密相关的。到了清代,闭关锁国成为清政府的国策,整个社会随之逐渐僵化,文化思想也趋于保守,著书又回到了“传道”的老路上。在这样的背景下,《杜骗新书》自然



也就不为人所重视,慢慢地淡出人们的视野,直至消亡。后来到了商品化再度兴盛的民国,也没有《杜骗新书》的版本流传,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此书早在清代就在国内绝迹了,出版人并不知道还有这本书的存世。直到1956年,李田意在《日本所见中国短篇小说略记》中,才始有记录。

倒是在日本,至少出现过三种出版发行的版本,不过底本都是“哈佛燕京”的陈氏后刻本。第一种扉页上刻有“杜骗新书,作者浙江夔衷张应俞。皇都书林五车楼梓”。前有“明和庚寅春三月初吉书于东武萱洲积翠楼。南官岳为公父撰。收十七则”。末有“文政元年戊寅初冬求版”。明和庚寅,为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文政元年当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从其中的信息可以看出,明和年也出版过一次,而文政年的这一版是据明和本翻刻的,且是删节本。而第三种是《杜骗新书译解》二卷,是一种译解详注本,扉页刻“大清浙江张应俞著。日本河原英吉译解”“明治十二年五月东京二书房发兑”。可见这套书是明治十二年也就是清光绪五年(1879)所写,而其中的明显错误就是河原将张应俞的朝代错写成了清代。

随着1956年李田意在《日本所见中国短篇小说略记》一书中,将《杜骗新书》公之于世,国内才开始认识这本书的价值。截至目前已经有多家出版社出版了此书,且所参考的底本也略有不同。另外,除了出版此书的原著,还出现了以此书为卖点的其他书籍。在出版社的这些努力下,《杜骗新书》又一次在国内为人所熟知。

在明末,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士农工商皆以追求“财”为荣。在奢靡之风盛行之时,也是骗风大盛之时,《杜骗新书》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不过随着朝代更迭,世风转变,《杜骗新书》失去了其在国内传播的土壤。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杜骗新书》有着初刻本和后刻本的根本区别:

(1) 初刻本最早为明万历书林张怀耿刻本,后陈怀轩存仁堂得其版,铲去“汉冲张怀耿”五字,这就是目前最流行的后刻本。

(2) 初刻本是有叙文的,且从叙文中可知最初名称是《江湖奇闻杜骗新书》;

(3) 目前国内出版的书籍多以哈佛燕京藏本为底本,但内容最为完整的当属山西古籍出版社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书籍。

打造精品 服务读者

《读通鉴论》编辑手记

□王守青(中华书局)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简称“三全”)系列之《读通鉴论》,是我们在疫情年做的第一部大书。《读通鉴论》是明末清初三大学问家之一的王夫之的一部史论名著,是王夫之阅读《资治通鉴》的笔记,涉及自秦至五代各王朝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而作为史学家、思想家、哲学家的王夫之思想博大精深,思辨能力极强,毛泽东曾把王夫之同西方的大哲学家黑格尔相提并论。要对其作品进行准确解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也是市面上迄今没有《读通鉴论》今注今译本的原因所在。考虑到这部书的重要地位,我们约请了作者对这部书做了注译,并在经过精心编辑后隆重推出。现从编辑角度,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该书的成书做一记录。

作者对底本的细致勘误

我们的注译本基本以中华书局1975年所出点校本为底本,另参考岳麓书社1996年出版的《船山全书》第十册中的《读通鉴论》,吸收其部分校勘成果。但中华书局的整理本和岳麓书社《船山全书》本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错误,在做注译工作的同时,我们的作者也注意对底本(中华书局点校本)的勘误工作。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原文中的形近错讹字,尤以年号、地名、姓名居多。如卷七“安帝一五”条:“建元中,守相坐赃,禁锢二世。刘恺以谓‘恶恶止其身,春秋之义,请除其禁’,持平之论也。”东汉并无“建元”年号,汉安帝倒是有年号为“建光”。据《资治通鉴》卷五十“建光元年”条目下的记载:“甲子,以前司徒刘恺为太尉。初,清河叔孙光坐赃抵罪,遂增禁锢二世。至是,居延都尉范邠复犯赃罪,朝廷欲依光比;刘恺独以为:‘《春秋》之义,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所以进人于善也。如今使臧吏禁锢子孙,以轻重,惧及善人,非先王详刑之意也。’”可知此“建元”确为“建光”之误。“光”与“元”字形相近,或为传写、刊刻之误。

又如卷三十“五代下六”条有“高行周拒之于澶洲”之语,此处“澶洲”当为“澶州”。澶州即今河南濮阳,一名澶渊,此处或许是杂糅“渊”“州”二字而误为“洲”字。

卷七“安帝一”条:“殇帝夭,庆子祐终嗣天位。”庆子祐,指刘庆之子、汉安帝刘祐。“祐”当为“祐”,《后汉书》《后汉纪》皆载安帝名“祐”,此处显系王夫之笔误或传写、刊印致误。

二、王夫之因记忆疏失而导致的用典错误。如卷四“宣帝一三”条云:“举四海耕三余九之积,用之一隅,民虽劳,亦不得不劳。”语本《礼记·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此处“耕三余九”显为“耕九余三”之误。

又如卷二十八“五代上一二”条:“中行衍说匈奴不贵汉之缟帛……然其以贻毒中国者,不如中行衍之强匈奴即以安汉也。”此二处“中行衍”应为“中行说”。据《刘向·新序》,中行衍乃先秦时期传说中的人物,与匈奴并无关联;而中行说,据《史记·匈奴列传》,系西汉文帝、景帝时人,原为宫廷宦官,后来因汉文帝强逼中行说陪送公主到匈奴和亲,对汉王朝怀恨在心,转而投靠匈奴,成为老上单于、军臣单于的谋主。结合文意,王夫之这里本意显然是指“中行说”而非“中行衍”。

三、因语意理解不当而导致的标点错误。如卷二“文帝十”条中有“文帝赦而徙之,与蔡叔、郭邻之罚等”一句,这是误以为“郭邻”是人名,实际上“郭邻”是地名,《尚书·蔡仲之命》云:“囚蔡叔于郭邻。”所以此处顿号应略去。

又如卷二十六“宣宗四”条:“伤哉斯言!所以惩李相、朱崖之祸,而叹宣宗之不可与有为也。”此处“李相、朱崖之祸”应为“李相朱崖之祸”。李相指李德裕,朱崖并非人名,而是地名,即今海南琼山,泛指海南。朱崖之祸,指李德裕被宣宗贬为崖州(今海南三亚)司户。

对于第一、第二类错误,作者的处理方式是保留原文原貌,在注释中予以改正和说明,以便读者理解。对于第三类的标点错误,则直接予以改正。

以内容为依据处理版本差异问题

作者的注译工作,以中华书局1975年版的点校本为底本,并参考了《船山全书》第十册的《读通鉴论》。我们在编辑过程中参阅的是中华书局2013年的修订本,这样在审稿过程中,就出现了因为版本的择取导致的一些细微问题。对此,我们主要从表述的内容角度加以分析,进行择取。

如卷十五《明帝》第六条,有这样一段:“赵武灵王授位于子,而自称主父,废长立少,恐其不安于位也。拓跋弘授位于子,而自称太上皇帝,子幼而恐为人所篡夺也。宗爱弑两君,而潘几不立;乙浑专杀无君,弘几死其手;故弘年甫二十,急欲树宏于大位,以素统臣民,而已镇抚之。犹恐人心之贰也,故先逊位于子推,使群臣争之,而又阳怒以试之,故子推之弟子云力争以为子推辞,而陆馥、源贺、高允皆犯颜以谏而不避其怒。其怒也,乃其所深喜者也。”(1975年版第450页)

部分标点,2013年本同1975年本有细微差别如下:

“故弘年甫二十,急欲树宏于大位。以素统臣民,而已镇抚之,犹恐人心之贰也,故……”(2013年版第463页)

这段文字,是说赵武灵王将君主之位传给其子,并自称为主父,他之前将身为太子的公子章废黜而立次子赵王何为太子,而他的传位之举则是因为担心以后不能稳固君位。北魏拓跋弘之所以传位于子而自称太上皇帝,是因为他担忧嗣子年幼,以防以后君位为别人所篡夺。就像宗爱曾接连弑杀太武帝拓跋焘、南安隐王拓跋余,而拓跋濬也差点无法安居君位。乙浑专杀且目无君主,拓跋弘也几近死于他手。因此,拓跋弘年刚二十,便急欲令拓跋宏即位。但他担心臣下怀有二心,所以他先将皇位传予拓跋子推,以此来挑起群臣的非议,随后才又佯装愤怒,并试着把皇位让给拓跋宏。因此,当时拓跋子推的弟弟拓跋子云极力为其兄争夺皇位并为拓跋子推申言,而陆馥、源贺、高允却不顾冒犯君主,极力劝谏拓跋弘立其子拓跋宏为皇帝。拓跋弘表面愤怒,而内心深处却不禁欢喜。

对“以素统臣民,而已镇抚之”,注译者按照1975年的标点,起初译为“平常之法统

治臣民,而自己则坐阵抚治”。但我们审稿时分析2013年本,从其标点情况来看,其意当为“以向来统治臣民,而自己坐镇抚治,还担忧臣下怀有二心”。这句话的主语不明,但就标点情况来看当为孝文帝拓跋宏。因为后文的“己”很明显对应前文的“弘”即献文帝拓跋弘。而就句意来看,是拓跋弘要传位给儿子拓跋宏,“向来”显然讲不通。如果说主语指的是献文帝拓跋弘,则句意更加矛盾,而且事实上即使拓跋弘在位期间,北魏的实际掌权者也是冯太后,“素统臣民”显然也缺乏史实依据。

同注译者对这句话加以深入分析,我们发现实际上这里的关键点在一个字上——“素”字。对于这个字,通常会按照它的常用意,理解为“平素、向来”之意,但这个字还有一个不常见的义项——“预先”。因为对这个义项的忽略,使得这句话产生歧义,难以理解。而中华书局1975年的标点本,“故弘年甫二十,急欲树宏于大位,以素统臣民,而已镇抚之。犹恐人心之贰也,故……”,依据这一义项来理解则较为合理,意思是“因此拓跋弘年刚二十,便急欲令拓跋宏即位,让他预先来统治臣民,而自己则坐阵抚治。如此,拓跋弘还担忧臣下怀有二心,因此……”这样句意上既讲得通,也符合史实。因此我们选择按1975年本的标点情况进行注译。

又如卷《唐太宗》第一条,1975年版的标点如下:

“言治者而亟言权,非权也,上下相制以机械,互相操持而交讎其欺也。以仪、秦之狙诈,行帝王之大法,乱奚得而弭,人心风俗奚得而不坏哉?”(第600页)

而2013年版的标点情况是这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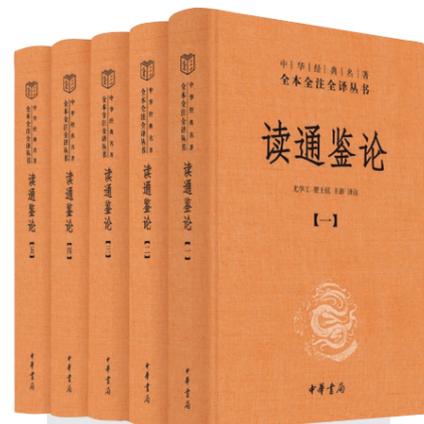
“言治者而亟言权,非权也,上下相制以机械,互相操持而交讎。其欺也,以仪、秦之狙诈,行帝王之大法,乱奚得而弭,人心风俗奚得而不坏哉?”(第616页)

这段话的意思,按1975年本的标点,是说:谈到治理国家,总有人热衷谈论权术,实际上这并非权术,而是君臣上下以机巧诡诈相互制约,各怀鬼胎而相互欺骗。以张仪、苏秦的诡诈之术,来实行帝王的大法,混乱怎么可能被消弭,人心和风俗怎么可能不败坏呢?

但如果按照2013年的版本,以“其欺也”作为下句开端,一方面下句中的主语不得不中途变换,语句不顺畅;另一方面“交讎”并非“交酬”,这里的“讎”字,是“兜售,实现”的意思,后面显然要跟宾语“其欺”,而以“其欺也”作为下句句首则导致“讎”没有了宾语。不论是从语意还是语法方面,1975年版的标点都优于2013年版,因此我们也选择按前者来处理。

借鉴其他版本的优长方便读者阅读

在书稿的编辑加工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岳麓书社的《船山全书》(2011年修订



《读通鉴论》

著者: 尤学工、翟士航、王澎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 2020年7月
定价: 288元
书号: 978-7-101-14622-6

本)第十册中的《读通鉴论》,将每一帝王之下各论另标题目。其说明,是依据清末湖南经元书局、大文书局、澹雅书局诸刻本中曾存在的一共同细目,加以校订补充而成。

我们的注译本依据的底本是中华书局点校本。该本以帝王为次第,其下各篇均以序号来加以分隔。该本所依据的为清代的金陵刻本。点校者舒士彦先生的《校点例言》中说王夫之的两种史论著作,“成于最晚之岁,盖读史有感,随事触发,初无意于为文,故每篇下皆不立题目”。金陵刻本刻印于同治初,其中的两种史论因“诵习者众,流传颇广”,故而“坊间多有翻刻,石印排印,不一而足,要皆自金陵刻本出”。则金陵本的整理者及中华书局本的点校者并不认为王夫之曾拟有此细目,其可能是后人整理遗著时所加。考虑到该书的普及性质,我们认为岳麓书社修订版的细目很好地概括了文意,更便利读者阅读检索及理解。因此我们与注译者做了沟通,决定借鉴、采纳这一修订补充过的细目。本着不掠人之美之原则,在前言中也对此加以说明了。

对于细目内容与文中内容不完全吻合处,我们以注释的形式加以说明。比如卷十九,一〇条《温大雅复李密雍商辛执子婴书》,内容里没有提到温大雅,就与注译者商量加以注释说明:“按:本节标题‘温大雅复李密雍商辛执子婴书’,似当作‘李渊复李密雍商辛执子婴书’更合文意。温大雅是李渊之记室参军,乘李渊之意图回复李密之书,不过代笔而已,故正文中王夫之亦不曾提及温大雅。”这样不会让读者感到文不对题,莫名其妙。

古籍译注图书的编辑出版,是一项细致而繁琐的工作。首先,它属于古籍整理范畴,需要作者的深厚学养和功力。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一个标点符号的差异都可能导致意思的截然不同。注译工作要择取并依据一种底本,但并不仅仅是完全迷信、拘泥于该底本,对底本的校勘辨误仍是其中的重要工作。其次,因为这是面向大众的图书,除了内容上的准确,形式上要利于阅读需求。这不仅需要编辑工作态度的认真细致,还需要视野开阔,既能够善于发现书稿中的问题,又能善于借鉴吸取他山之石的优长,这样才能提供给读者注译精当、雅俗共赏的作品。